

# 烈士的妹妹告诉我

## ——访原黄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于耀光烈士的妹妹于惠英

□于泉城



3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夫人怀着激动的心情,与龙口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简称“老促会”)周学军、吕海杰、尹新利以及龙口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周等人,前往青岛市城阳区的一家养老院,采访胶东革命烈士于耀光的妹妹于惠英。

在龙口市,革命烈士于耀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于耀光原名于家礼,1921年9月生,蓬莱县潭子乡蓬花泊村人,出身贫农,曾读5年小学。15岁那年,于家礼因生活所迫,去大连(于家礼的姨夫家)鞋铺当学徒。期间,面对日本法西斯的血腥暴行,目睹了同胞们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悲惨生活,他在心里埋下了抗日复仇的火种,决心要为改变黑暗世界而斗争。第二年,于耀光回到家乡务农和上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17岁的于家礼再也没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下决心抗日救国。在于家礼上学时,他的老师王永利(原名赵会杰,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就发现他是个好苗子,经常借给他进步的、革命的书籍,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此时王老师也支持和鼓励他参加革命,并对他说:“你爱祖国,为祖国光明而战斗,就把名字改为‘耀光’吧!”

1937年,在父亲和家人的支持下,于耀光投身革命队伍,开始在蓬莱行署工作,由于思想觉悟高、工作积极,被组织选送到党校学习,并于1939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40年起,于耀光先后任黄县县委社会部一科科长、黄县公安局副局长、北海区公安局二科副科长等职,1943年7月调任招远县公安局局长。其间他多次带领公安战士袭扰敌人据点,捉拿汉奸,瓦解伪军,打击歼灭小股骚扰之敌,威震招远。1945年9月,于耀光任黄县县委书记、公安局局长,1946年1月至3月兼任黄县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1947年4月任黄县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

1947年9月30日凌晨4时,黄县县委副书记谢华和于耀光带领的公安局政卫队50多名战士经过一夜的行军,来到黄县诸由区后柞杨村。凌晨6时许,他们被国民党第8军42旅东进部队一个营及便衣队包围。突围时,谢华带领一部分战士冲出包围圈,于耀光在击毙四五个敌人后,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1947年12月7日,黄县城解放。12月9日,黄县民众一万多人在县城参加了于耀光烈士的追悼大会。大会上,于耀光的画像挂在苍松翠柏搭成的烈士塔正中,会场庄严肃穆,县委、县政府各部门及各区委都送来了花圈、挽联。会场两边的挽联上写着:“生前为劳苦大众英勇奋战,牺牲如日月星辰光耀人间。”为了纪念于耀光烈士,黄县政府根据民众要求呈请北海专员公署批准,于1948年2月1日将黄县诸由区(于耀光殉难地)改为“耀光区”。1956年8月,黄县凤凰山革命烈士陵园开始建设,于耀光烈士之墓被移进烈士陵园。

说来也巧,于惠英不仅是我的本家姑姑,还是我父亲1953年至1955年在蓬莱一中的同班同学,于惠英是班长,他俩的关系非常好。当年初中毕业后,父亲曾步行往返30多公里去于惠英家看望她一家人。20年前,父亲还曾去青岛莱西看望过她。

采访烈士亲属是龙口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今年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是慰问烈士亲属,缅怀革命先烈,进一步挖掘烈士素材,弘扬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更好地教育后人。

汽车在龙青高速上疾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两天前联系于惠英的片段。通话中感受到于惠英是个比较低调的人,听说龙口市的领导要求来采访她,她本是想谢绝的。她说:“我非常感谢龙口市领导还挂念着我们这些烈士的亲属,但是我不想因为自己是烈士的妹妹而引起社会的关注和特殊照顾。比起许许多多的革命先烈,我觉得我们家这些事不算什么。再说我二哥哥于耀光离开家庭参加革命时我还小,对他的事迹了解的并不多,很担心会让龙口市的领导失望。”我说:“于耀光的英雄事迹,此前龙口市的有关资料多有记载,但是对于耀光的家庭情况及生活环境了解很少,您可以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记得我父亲说过,您的父亲于乐云就是老党员。”于惠英说:“如果这些事情对爱国主义教育有帮助,我可以谈一谈。”

在养老院里,于惠英对我们非常热情。她已经88岁高龄,精神状态很好,非常健谈,语言流利,用词准确,逻辑性很强,我感觉这可能与她从事的工作有关。她退休前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莱西市第四中学的语文老师 and 副校长。交谈中,我们果然获悉了烈士家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于惠英的印象里,父亲于乐云在家里务农,却经常不在家里居住,而是与村里地主家的长工们居住在一起。于云乐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家里是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当时家人并不知道父亲正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只是感觉父亲做是一项特殊的工作,每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都让孩子们在院子门口放哨,他则与客人关门关窗商量事情。于惠英还清楚地记得,日本鬼子和伪军曾到她家里抓捕父亲,由于得到了内线消息,父亲提前隐蔽了起来,才幸免于难。

于惠英告诉我们,她兄妹6人,其中4个哥哥、1个姐姐。她是最小的妹妹,也是于耀光烈士兄妹中目前唯一健在的见证人。

于惠英对二哥哥于耀光的印象是模糊的,因为于耀光参加革命时,她于惠英才2岁。此后于耀光再也没有回家探过家。她对耀光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1947年秋天的一天,那天父亲在家里坐立不安,不停地叹气,时而哭泣。于惠英及四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父亲身体不适,便小心翼翼地上前询问用不用去找医生,这才得知抗日政府派人传来噩耗,说于耀光在黄县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了,年仅27岁。全家人都禁不住痛哭起来。当时当刻,我们一行人也情不自禁地想象到当时的画面,内心同样感到惋惜和难过。

自己的哥哥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成为千千万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于惠英感到非常自豪。同样自豪的是,在父亲的教育和带领下,她的3个哥哥都是革命军人。于惠英记得,在解放战争初期,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在村民大会上号召青年人积极参军入伍。为了以实际行动带动大家,他将大儿子于家海和四儿子于家勇拉上主席台,双手举起儿子们的手,高喊:“参军去,英勇杀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时至今日,她仍有些激动地说:“当时我还小,否则也会毫不犹豫地报名入伍。”最终大哥光荣入伍,四哥因体弱多病体检不合格没有如愿。

于惠英告诉我们,他的哥哥姐姐都是好样的,除四哥于家勇在家里务农、不是党员外,其余的哥哥姐姐和她本人都是共产党员。大哥于家海参加了解放战争,在部队参加了多次战斗,光荣负伤,被评为二等残疾军人。大哥不愿意给部队添麻烦,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申请离开部队,回家务农,后来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三哥于雁鸣在村里上学期间就加入了部队,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上留下了9个枪眼;中华人民



作者和爱人向于惠英赠送父亲于铭钦的画集。周学军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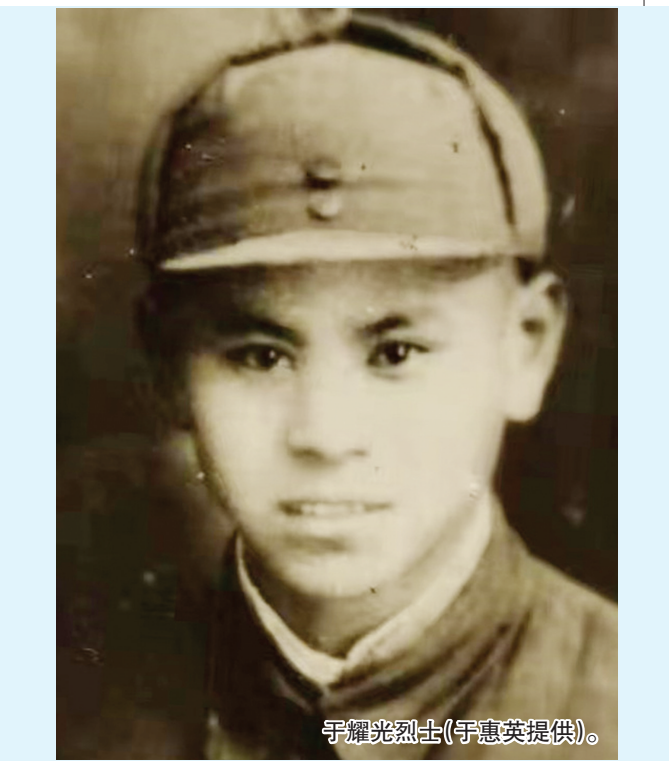
共和国成立后,他到济南荣誉军人学校担任教员,后来转业到家乡蓬莱县粮食局工作。姐姐于秀英虽然没有入伍,但是194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村妇女主任,工作中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受到党组织和群众的称赞。

用满门忠烈来形容于乐云一家,真是恰如其分!这是多么可敬的老人,多么可敬的一家人啊!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和信仰,如此宝贵的革命教育素材,影响和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采访,而是一次净化心灵、催人奋进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于惠英还谈到于耀光有个未婚妻,名叫田淑玉。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忙于革命工作,他们的婚期一拖再拖,还没有等到举行婚礼的那一天,于耀光就牺牲了。出于对恋人的怀念,田淑玉终身未嫁。多年前,田淑玉老人也去世了。巧合的是,随行的尹新利与田淑玉老人是一个村的,他向我们介绍了田淑玉的有关情况。我突然想起,去年在与于耀光的战友,时任黄县县委副书记、原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谢华的儿子的通话中得知,谢老虽然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但是每次回家乡龙口,都要抽时间和夫人一道去看望田淑玉,谢华与于耀光深厚的战友之情可见一斑,令我备受感动。

采访结束时,于惠英动情地对我们说:“感谢党,让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就拿我来说,退休了有退休金,衣食无忧,在这么好的养老院里安度晚年。我深深地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加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教育子孙后代继承先烈的遗志,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发扬革命传统,干好本职工作,将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和富强。”

这是烈士妹妹的心声,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愿!



于耀光烈士(于惠英提供)。

## 那些年玩的扑克

□潘云强

改革开放前,文娱活动少,烟台人爱玩扑克。

烟台人对扑卡牌的叫法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如称呼A为尖子、冒头;二为二鼻子、钱、炸弹;J为丁、勾或十一;Q为皮蛋、十二或直接称皮球;K为老凯、十三;大王通常叫司令、大鬼、大花;小王则为副司令、小鬼、小花。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烟台人最常玩的扑克游戏是捡分。此游戏没有什么讲究,人多人少皆可玩。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便与姐姐玩扑克。两个人玩牌不用全部摸完,否则双方就会清楚彼此的底牌。一般摸到七张为止。“5”为五分,“10”和“老K”各为十分。谁的牌大,就被谁捡去。一方超过五十分为胜方,胜负的判断一目了然。一般胜利者可以打对方的鼻子眼,也可以吃对方的进贡。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住在民生胡同,解放路小市离我家不远。小市上有不少打扑克的人。那个年代,公共场合玩扑克如同在路边演戏般扎眼,我常在旁边看热闹。其中有四五个中年人,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分别叫涛子、大山、祥子等名字。有一个年近五十、身材魁梧的人,赤红面庞,浑身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酒气。此人鼻子长得像一个紫红色的大草莓,不少人背后叫他“酒糟鼻子”。那时,三马路小市常年有卖油条、油炸糕的摊位,也有卖炒花生米的。他们玩扑克,输的一方要请胜方吃油炸糕或花生米。输的一般是涛子,他极力掩饰内心的尴尬与不安,佯装高兴地跑去把东西买将回来。油炸糕为糖心,妈妈曾给我买过。趁热吃外皮酥酥,但要小心糖水吡出来烫着嘴;如果凉了吃,死贴贴,味道差很多。

还有一种玩法叫跑得快,人多时须用两副牌。如果牌的号码能够按顺序一字排起来,可以五带一、六带二、七带三等。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把一些小牌顺出去。牌先出完的胜,谓之跑得快。三个人打一副牌时,叫斗地主,也叫二打一,由两个农民组成联盟,对付地主。这种扑克玩起来娱乐性较强,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游戏方式。每当星期天、节假日或是夏天的午后,一些老头老太太坐在胡同口的树荫下,手拿纸牌,不急不躁地来上几把,中得我一种岁月沉淀、时光停滞之感。

上小学后,我喜欢玩一种叫“吊吊”的扑克游戏。玩它一般需要两副以上扑克,四个人,坐在对面的人是一帮的,故也叫打

牌,便叫够级。游戏中,最早出完手中牌的叫头科,次之为二科;手中牌未发完为败者,称为大落(发“拉”音)、二落。玩下一盘时,后两人要向前两人进贡。够级还有不少“逢Q盖帽,有单不发三”“小花挂四,不出也恣”等顺口溜。此玩法最有看点的是烧牌:即一名玩家出了够级牌后,如其他玩家手中的牌足够强大,不仅可大过当前的够级牌,而且在之后出牌时每手牌都至少带一张“王”(最后一手可以不带),该玩家就可以烧牌。如果烧牌成功,下一次玩牌时,被烧牌者需向烧牌者交纳烧贡。当然也有反烧,出现这类情况时,意味着大逆转。此时牌桌大有风云突变、乌云压城城欲摧之感。反烧无疑是够级玩家们最过瘾、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那时,烟台大剧院的原址还是少年宫,那儿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西侧是烟台市大型展览馆(即现在的烟台市博物馆)。人们习惯将此地称为大展,是够级者的天堂与洞天福地。当时那儿流传着一个牌痴在结婚典礼上牌瘾突然发作,“二虎”得竟与几个喝醉酒的朋友又玩了几把够级,方才踱入洞房的故事。每天,来这儿玩够级的人按摊数计足有十多处,每个牌摊都有很多站着围观的人。令人惊奇的是其竟会吸引一些花枝招展的小姐姐前来观战,据称多为玩扑克者的女友。她们在一旁娇声细气地呐喊助威,分散着众人的注意力,也让激烈火拼的场面添了些阴柔之美。一旦下雪、下雨,牌友们便躲进展览馆的宽大屋檐下,照旧玩得热火朝天。我也是不折不扣的够级迷,家就住在华茂小区,如果没事,我也会来摸几把。

俗话说“熟能生巧”。够级玩久了,便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牌精。无论是联邦或是对手,只要一发牌,牌精们就能将所有玩家手中的牌况及意图分析得大差不离,并制定出相应的策略。有些人把够级当成一场游戏,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够级的剧情发展通常是这样的:一个玩家在手中牌“宽头”(牌好之意)时,不是忙于自己先走“科”,他的最高原则是即使自己当“落”,也要让联邦顺走牌乃至抢到“科”。当然,在此过程出现的更美好的事情是:人们从中获得了宝贵的团队精神以及满足与快乐。

如今,每每回忆起那些玩牌的时光,总有一种莫名的情感在胸腔鼓胀,仿佛轻轻一挤,便汁液流淌。

4月4日,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志愿军研究会邀请山东海阳籍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学风的侄子王茂磊和黄继光的侄子黄拥军等烈士后人,共同参加了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的“共和国不会忘记,擎旗自有后来人”——2024年沈阳清明节千人祭奠志愿军英烈大会。

王学风(1926年至1951年),海阳市北城阳村人。1942年夏天,16岁的王学风正式参军入伍,后调入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特务连,常在烟台和文登一带活动。1945年,他随八路军部队挺进东北。后来,他所在的部队因故改编为警察部队。1948年,王学风在辽宁锦州加入解放军,朝鲜战争爆发后,随部队入朝作战。1951年4月,在华山山前沿阵地,面对联合国军的进攻,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二〇师三三五八团一营三连副班长的王学风,率领20人战斗小组打退敌人的第二次进攻时,脸腮被子弹打穿,头部中弹,昏迷过去。不久后,苏醒过来的王学风听到敌人的枪声愈来愈近,便命令战友赶快撤离。敌人合围过来,用机枪扫射,把他的双腿打断了。不能站立,他就坐着、爬着继续战斗。为了不当俘虏,王学风拼尽最后力气摔断步枪滚下山崖,壮烈牺牲。《四十军在朝鲜》中记载:四十军军长温玉成回国汇报工作,当讲到王学风的英雄事迹时,“毛主席听得入神,竟忘了吸烟,香烟上积了长长的一截烟灰。主席半闭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光亮,那是为自己的战士而自豪的泪”。

王学风曾一度被误认为安徽砀山籍烈士。2022年11月、2023年3月,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原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上将之子陈人康,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志愿军研究会会长、原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上将之子邓穗分别致函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表示经“综合分析,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学风籍贯应是山东海阳北城阳村”,建议联合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海阳市委、市政府等组成联合调查组,就王学风籍贯问题进一步调查考证,作出结论。2023年3月,根据两个研究会建议,由烟台市委史、退役军人部门会同海阳市委、市政府组成24个人的调查组开展调查取证工作。调查组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持“对烈士负责,对烈士家属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多次与先期志愿调查者开展座谈交流,面对面与相关证人沟通对话,到海阳北城阳村实地查看地契、烈士谱,到北京解放军档案馆查阅档案,到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请人指数,调阅海阳、砀山两地的党史史志文献资料等,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经综合研判,确定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学风是山东海阳籍烈士。其间,原志愿军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五九团团长邓士均烈士之子、志愿军烈士后代联谊中心主任邓其平多次到烟台、海阳实地调研指导。在此基础上,调查组撰写形成了《山东省海阳市失踪军人王学风烈士有关情况调查报告》。除了正文外,《调查报告》附有150页、29份证明材料,包括7份公证书,还有2017年5月海阳作协赴砀山采访的全程录音录像等6个视频资料,并出具了《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学风烈士籍贯认定意见》。调查组还从多个方面证明了英雄的名字是王学风而不是王学风。2023年12月12日,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主持召开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学风原籍查证总结交流会议,通报了王学风原籍问题调查研究过程,审议通过了《调查报告》和《认定意见》。至此,王学风烈士真实籍贯水落石出。

中共山东省党史研究院近日即将付印的《齐鲁英模谱(抗美援朝卷)》一书,正式将王学风作为山东海阳籍英烈收录在内。

## 高吉波《泰山笔记》入选初中语文教辅读本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近日,烟台籍作家高吉波的散文作品《泰山笔记》入选山东省初中语文教辅读本《对一朵花微笑》,即将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据悉,此前高吉波的另一篇散文作品《雪地里的红棉袄》至今已在全国各类大学、中学、小学的不同语文读本里保留了23年,并被多省市中考语文试卷选用。高吉波,现任烟台市作协副主席,早年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后涉文学、书画创作,已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四百余万字。其中,长篇小说《城门》获第十四届华东地区优秀文艺图书奖,中篇小说《大酒窖》获烟台市第十届文艺创作奖;其部分书画作品于2017年被制成邮票,在海外发行。

据了解,《泰山笔记》《雪地里的红棉袄》的最初发表时间都在20多年前。高吉波认为,文学作品唯有关爱人性、关爱自然、关爱人与自然,才有可能成为经典。

另据中影集团著名制片人马宁介绍,经高吉波多年打磨、创作完成的同名电影剧本《雪地里的红棉袄》也广受业内赞誉,将于今年开机拍摄。

### 征稿启事

为更好地发掘烟台的文化元素,本报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您所知道的发生在烟台以及烟台相关的事件、人物、故事等稿件,要求稿件内容真实、准确、严谨,可读性强、故事性强,且有据可查。

投稿邮箱:ytzbkzb@126.com

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学风是咱海阳人

□李永军 于雪